

金學成主編

日本研究叢書之五

亡命十六年

野坂參三著

金學成譯

『民主的共同戰綫是世界的潮流，歷史的潮流。祇有我們日本從這世界的、歷史的潮流除外，這是不應有的事。如果想從這個潮流把日本除外，這事會導日本於滅亡。』

譯序

日共領袖野坂參三的「亡命十六年」，正和同是日共領袖德田球一，志賀義雄合著的「獄中十八年」一樣，是在日本最爲人民大眾所愛讀的自敘傳。譯者把牠譯出，在遠東唯一大都市上海被英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的今天獻呈給全國人民大眾，倒並不單純地祇爲了牠是戰後日本銷行最廣的一本名著，和牠的內容是日本人民領袖以自己熱情的筆寫下的活生生的鬭爭史。主要還有着下面的原因在驅使我，鼓動着我，排除萬難，譯完於通緝追捕的驚恐顛沛之中。

中國人民在抗戰八年中受盡了日本瘋狂的軍事法西斯主義者的迫害，所以在每個中國人民的心裏無不希望已因戰敗而倒下的在手上沾染着中國人民的血跡的日本反動派永遠不會再爬起，也無不祈求這批泯滅了理性的殺人魔的衣鉢繼承者永遠不再在日本出現。可是中國人民的這種由衷的一致期待，怎樣才能實現？毛主席在日本還未投降的一九四五年四月，卽已在「論聯合政府」中正確地指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並無條件投降之後，爲着徹底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軍閥主義及其所由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原因，必須幫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沒有這種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徹底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與軍閥主義，便不能保證太平洋的和平。」比這略前，野坂在初到延安

時，也曾對往訪的解放日報記者強調着中日兩大民族的民主勢力的緊緊攜手，說：「由現在世界情勢和地理關係說，中日兩國共產黨今後應本互助精神，加強合作，更積極地展開東方民族的人民戰綫運動」。我們被中日兩國的人民領袖完全一致的上述論斷所提醒了的一點是，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才是太平洋和平的保證，另一點是，這種民主制度的建立有賴於中日兩國共產黨的互助合作。

現在，在日共領導下的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正在和反動勢力的堅苦鬭爭中一天比一天接近人民民主的燈塔，特別是今年一月的普選，日共所獲得的衆院議席由四名一躍而爲三十五名，所獲得的選票由一百萬票一躍而爲三百萬票，使議會中的反動黨派相顧失色，這事不但明白表示日本民主勢力已建立了向民主制度之樹立跨了巨步的豐偉的里程碑，同時也是最近僅亞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偉大勝利的歷史性的事件。日本人民民主力量獲得這樣的輝煌戰績，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受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所獲決定性勝利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換言之，中國人民民主力量的勝利幫助了日本人民民主力量的成就，是很明顯的。但是，另外的重要原因，則爲了日共所領導的鬭爭路綫的正確，也是鐵般的事實。原來直到日本投降爲止，日共一徑主張暴力革命以達成無產階級專政，所以向來被天皇制思想癱瘓了的日本一般人民所望而却步，可是野坂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回到祖國以後，他即積極進行人民戰綫運動，主張在這戰綫中不但應有工農及小資產階級參加，還應讓一部分產業資本家即民族資本家參

加；那就是要在日本實行新民主主義。並且他還提出了一個新口號作爲黨的努力目標，即「可愛的共產黨」，務必使日本一般人民對共產黨的觀感，以「可愛」代替過去的「可畏」。野坂所倡的這一正確的領導方針，現在果然獲致了效果，他已成了日本人民感激與信賴的視綫所集中的偉人。

但是野坂的成就決不是偶然的，毋寧是他所具的時代背景和他的經歷以及他的英明的認識，才是決定他今日成就的因素。他生於軍封帝國主義的日本，熟知日帝發展的內在矛盾；他到過美國，研究過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國家的缺陷；他到過英法德諸國，對爛熟期的資本主義國家具有深切的了解；他到過蘇聯，第一次在大革命後不久正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代，第二次在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突飛猛進的時代，使他體驗着蘇聯所由成功的曲折的道路；最後他在中日戰爭期內在延安住了多年，經常和中共的領袖們在一起，也目觀着中共領導下的中國人民民主力量的日益壯大，使他深深體驗着半殖民地國家走向獨立解放，民主進步的成功途徑。這些，都是野坂比了其他過着多年獄中生活的日共領袖們在把握黨的正确指導方針上處於更有利地位的原因。

中國人民解放全中國將是一九四九年內的事，這即使在不斷爲國民黨反動派輸血的美帝也不會有勇氣否定吧。等到四億五千萬中國人民完全獲得解放的一天，全世界人口就有二分之一站在共產主義的大纛之下，國際帝國主義企圖抹消光明的陰謀將更明顯地會成爲徒然；

但是國際帝國主義爲了作臨死的掙扎，必定不會忘記使出所有一切更卑劣更殘酷的方法。特別是在日本美帝已和日本獨佔資本的代言人，賣國的買辦反動政府勾結，以日本人民的血汗和生命作爲賭本，進行反蘇反共的大陰謀。我們爲了阻扼美帝卵翼下日本軍事法西斯的捲土重來，爲了保證太平洋乃至全世界的恆久和平，對這種陰謀應有最高度的警覺；正唯如此，中國人民應以最大的力量來「幫助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我們尤應盡可能支持正確領導着日本革命的日共領袖，也是中國人民親切的友人，通過他們給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以最大的支援。

在本書中，即將展開這個親切的國際友人的真實而生動的故事。

一九四九·五·二五·大上海解放之日。

亡命十六年

目次

亡命以前

一 出身	一
二 加入友愛會	二
三 在倫敦入黨	三
四 在「市谷」迎接大震災	五
五 再度入獄	八
六 老鼠和特務	九
七 逃出故國走上亡命之旅	一一
蘇聯的印象	
一 作爲岡野進的生活	一三
二 偉大的片山潛	一六
三 片山潛的國葬	一九

四	被重視的蘇聯兒童	二一
五	學校種種	二三
六	豐富的私有財產、優裕的生活	二六
七	打扮的莫斯科姑娘	二八
八	無賊之國蘇聯	二九
九	休養所生活	三〇
一〇	完全的民族平等	三三
一一	指導者的印象	三五
	(A) 史達林	三六
	(B) 狄米托洛夫	三八

延安生活

一	從蘇聯到延安	四〇
二	研究祖國是第一項工作	四二
三	日俘的教育	四四
四	對日軍的政治活動	四七

五	優厚的八路軍對俘虜待遇·····	五〇
六	延安這地方·····	五二
七	邊區的政治·····	五六
八	第三國際的解散·····	五八
九	毛澤東的印象·····	六〇
一〇	朱德的印象·····	六五
一一	中共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	六七

走向國難的祖國

一	太平洋戰爭與反戰關爭·····	六九
二	亡命告終·····	七一

一 亡命以前

一 出身

我在明治二十五年（一八九二年）三月，在山口縣的萩町生下，爲商人兄妹六人中最幼的孩子。萩町，有如大家所熟知，是吉田松蔭的出身地，是在松蔭的明倫館受了教育的青年活躍於明治維新，而成爲藩閥政府的母胎的地方；可是同時，也是前原一誠掀起騷動的地方，明治維新的革命傳統在當時也還殘存着。

我家雖是小商人，但在我幼年時破產了。從此，我的兒童時代完全在赤貧中過着。年長的哥哥和姊姊們遠離鄉里去工作，靠他們工作着寄來的錢，勉強維持着一家。在這樣貧窮的兒童時代，受着因爲當地是田中義一大將出身地之故的軍國主義影響，希望成爲軍人，一時也曾決定要進陸軍幼年學校。但是在小學生時代，家人却說因爲家裏窮，還是做個商人吧。

十四歲時，父母都死去了。結果，就只得神戶經營木材商的長兄那裏，由他撫養了。在神戶，雖進了商業學校，但從畢業以前起即已接近着社會主義思想。這事的動機，一點是因爲家庭生活的貧困，再一點，則因爲在畢業前不久即明治四十三年（一

九一〇年）發生了無政府主義者幸德秋水的事件，是受了這事件的影響。這個歷史的事件，我的心裏植下了對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興趣。關於幸德事件我所得的印象是，他是為社會主義而戰鬥的一個英雄。明顯地開始對社會主義發生興趣，則是在美國的陳舊的資本主義經濟學者伊里的書中偶然發見了有論述社會主義的一章，而把牠緊緊抓住著讀了之後。這書，是當時出版的很馬虎的東西，在現在看來是可笑的書，但總之牠曾給我刺激。畢業時照例要寫畢業論文，我就寫了一篇「論社會主義」的短短的論文。可是先生看了非常憤慨，當着全級學生的面，嚴厲地責罵我，說這是學校的不名譽。但是我並不覺得什麼可恥。

在這個商業學校畢了業，十九歲時到東京，進了慶應大學的理財科。

二 加入友愛會

我的思想大踏步地社會主義化了。即使在學校裏，對功課方面也不大用功，却歡喜跑舊書店，貪婪地讀着國內外出版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書。而且在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年），加入了最近才死去的鈴木文治所主持的友愛會——即以後的勞動總同盟。

從這時起，我踏進了社會運動的實際活動。雖還是學生，却已擔任了教育勞動者的工作，和神戶的川崎造船所的勞動者以及東京的金屬勞動者，親密地交往着。在那些勞

動者中，有以後在關東大震災時以龜戶事件而被殺的平澤計七等人。其後也是每逢有機會，去參加勞動者的集會。在學校讀書時代，我的朋友幾乎沒有一個是學生。母事在勞動者中有我的朋友。那時，在思想方面，受着爲當時日本革命的勞動者所支持的 *syndicalism*（無政府主義的革命的勞動組合主義）的影響。因此我的工作也傾向於勞動組合的革命化這一方面。

在慶應大學一畢業，依照代替了父親的地位的神戶的長兄等的意思，是要我馬上做公司職員，可是我不聽，却決意專心致力於友愛會的工作。我担任友愛會的書記，幹着機關紙的編輯和教育等工作。月俸是四十圓；但這也只幾個月便告終，以後靠翻譯等工作來過活。

○在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發生了。我受着極大的影響，以後我的思想即走向共產主義的方面。

三 在倫敦入黨

在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歐洲大戰剛終熄時，我以友愛會特派員的形式到英國。費用是由神戶的長兄負擔的。在英國，調查和研究該國的勞動運動，同時，也參加英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在翌年即一九二〇年英國共產黨產生時，我立即入黨。在第一屆黨

大會中，我作為倫敦支部的代表出席，其後，在共產黨的各種集會中演說。因此，被 Scotland yard（即倫敦的警察廳）所嫉視，接到了在三日內必須出境的命令。於是離開英國到法國，再從瑞士到德國，在這個期間，一直被 Scotland yard 追蹤監視着。在法國，在巴黎住了一個月光景，那時一點也不知道，可是離開那裏到了瑞士，就有法國友人來信，說在我動身的翌日，就有法國的官憲跑來過。到了柏林，暫時沒有什麼，可是過了兩個月，突然有便服的怪男子走到旅邸來，喚着我的名字，調查我的行動了。這人帶來了搜查用的照片給我看，可是實際上，那是和我面貌相似的英國人的照片。我抗議着這照片不是我時，他露着半信半疑的奇妙的神情回去了。在德國，調查着德國的勞動運動，可是不久，因為這項工作已告了一個段落，所以離開那裏到俄國去了。在俄國住了一個月光景。那是一九二一年的事，因為革命後還沒有多久，所以當時還很荒涼，從俄國回到歐洲，從馬賽乘船，走上了歸國之途。在蘇彝士、哥倫布、新嘉坡、香港等許多靠岸的港口，必須獲得許可才能登陸，但我因為有 Scotland yard 在作祟，所以英國官憲並不給我許可。

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回到了日本，還是在從友愛會改了名的日本勞動總同盟中，協助着機關紙「勞動」的工作，翌年秋，被母校慶應聘為臨時講師，我接受了。以「世界的社會問題」這題目，講授了三個月。在學生中有野呂榮太郎和秋笹正之輔；並

且慶應在這時才產生了社會科學研究會。

四 在「市谷」迎接大震災

在這一年即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日本共產黨以堺利彥和山川均爲中心而成立了，我被勞動總同盟內的共產主義者牽引着，立即加入了這個黨。翌年三月，在東京郊外石神井的榮館，僞稱肥料公司的總會，而開了非法的黨大會，但是却因此而被警察偵知了黨的存在，和其他的黨員一起，我也在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六月遭了逮捕，到十二月爲止一直在獄中。

在那個期間內，發生了那次關東大震災。在市谷的獄中遭遇的震災的經驗，真令人不能忘懷的。

震災的那天，恰巧在剛吃完午飯之後，搖搖幌幌地震動起來了。起先還什麼都不知道。後來在天花板上吊下的電燈，開始劇烈地轉圈子了。這才「不得了！」知道是地震。感到這不是普通的地震，奔到窗前一一看，我的監房面前的廚房的高煙囪，看着牠倒下了。廚房已全部潰裂。我也覺悟着，認爲已糟糕了。這時，禁卒突然從外面給我開了門。這事如果依照獄規，是不行的。因爲必須有了所長的命令才能放出犯人的，可是這禁卒却並未得到命令就擅自把我們放出了。究竟爲什麼放出，固不知道，不過我們這些

人大概都是共產主義者，也許是爲了同情我們，否則爲了本來具有正義感吧？——不過不管怎樣，總之立即把我放出了。走到屋外一看，則放了出來的全是我們這些共產主義者的集團，從外面望裏看監房時，犯人的大半還留在裏面。他們拉着窗上的鐵格子發出悲痛的聲音『請放出吧！請放出吧！』可是並不去放。震動了一會，雖然有瓦掉下來，但房子則也許因爲木造的緣故，却没有倒塌。地震大體平靜下來之後，才把其他的犯人也放出了。全體集合到了院子中央。其中有小偷，也有殺人犯，可是大家非常歡喜。有將近一千個人擠在廣場中。我們的力量強大起來了。大概是所長立即把這事報告了軍隊吧？——不久在監獄的圍牆外，就已有軍隊來包圍着了。到了傍晚，軍隊鎗上插了刺刀走進院子，對我採取了包圍的姿勢。

翌日，犯人們取得了聯絡，以每個獄舍一人的比例，推出代表，組成代表委員會，向所長提出了全體釋放的要求。所長說絕對不放。他說，依照獄規，如果獄舍起了火，不妨釋放，可是現在房子也還沒有倒塌啊！代表把這話報告了全體。於是在犯人中問——我們雖沒有參加——開始進行陰謀了。在他們中起了這樣的議論：既說獄舍起了火可以出獄，那末索性放一把火吧。有少數人，祕密地決定了這個部署。預備把燒飯的火拿來投入監房內，掀起火災，並且已開始作這項準備工作了。但是這事被監獄方面的間諜聽到，把陰謀暴露，自此以後，我們的身邊就變得非常嚴重了。鎗上插了刺刀的軍

隊，不斷地在我們週圍巡迴了。這樣，釋放的要求既已無望，於是犯人代表委員會提出了新的要求。這要求是：把我們的代表者數名釋出，叫他們視察東京，什麼地方遭火災，以及燒毀的程度，他們看了後來報告全體知道。但是這要求也遭了拒絕。於是，代表者就把這個交涉的經過向衆人演說。其中有一個人極會說話，作了非常高明的演說，使全體興奮，並且大加煽動。也有流下眼淚嗚咽着的。這時所長跑來，命令停止，犯人們就激憤着對抗，開始投石子，可是忽然發覺在我們背後大約有一小隊的兵，已在舉鎗作射擊的準備。我們驚駭了。盡量想走得距離鎗口遠些，拚命地逃跑了。

從此以後，監獄方面便借了軍隊的力量來反擊，我們被釘上了手鐐，完全失去了自由。但是被認為最下等的人的監獄中的囚犯，却能組織堅持他們主張的代表委員會，這是很有趣的。

震災發生後第三天晚上，大家都被關入了還在搖動的房子裏，可是我，則與堺利彥爲鄰，都被迫睡在走廊裏。

後來才聽人說，殺死大杉榮的甘粕大尉們的那個憲兵隊，這時會走到監獄來要求交出我們這批共產主義者，但是所長說監獄屬於我的管轄，不屬憲兵管轄，所以不能引渡，而加以拒絕了。憲兵們好像每逢有機會就要把我們殺死似的。實際上，我們也因為在監獄裏才平安無事的。當時如果在外面，也許已遭了毒手也未可知。在江東方面，有

龜戶事件發生，友人平澤計七等人被捕，被憲兵所殺。平澤雖是純粹的勞動者，却也能寫小說之類，真是可憐的人。

五 再度入獄

震災告終後，就在那年的十二月，保釋出獄了。一出來，就再入勞動總同盟，繼續幹有關組合的工作，同時也屢次舉行黨的再建起見的祕密集會。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三月，總同盟的調查部發展了起來，產業勞動調查所已作為獨立的機關產生了，我被推為所長，發刊了「產業勞動時報」和「國際」這二種雜誌。這個調查所，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研究日本及世界的政治、經濟、勞動問題等，並且靠着出版物而對於學生和勞動者的思想上，給了很大的影響。

在翌年即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總同盟分裂為左翼和右翼了。並且左翼被開除後組成了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於是我擔任了這個評議會的思想的指導。自此以後，雖曾參加勞動農民黨的創立，日本共產黨的合法機關報「無產者新聞」的編輯，不過在那時，因為有二年前的第一次共產黨事件的判決，結果在監獄中受了八個月的徒刑。這樣一直，從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到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為止，我專心從事於黨的工作，可是在昭和三年三月十五日，遭了所謂三、一五的一齊檢舉，我在睡着的時